

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前沿与展望^{*}

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钞晓鸿

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前沿与拓展方向，海外学者业已有所论述：有学者主张考察自然环境的变化，人类对自然的认知，以及资源边疆、水利系统、森林木材、大型役畜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问题；^①另有学者从其他方面补充了若干议题。^②中国内地学人也提出了努力的方向。^③不过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，学界的讨论并不多。本文立足于中国实际，分别以环境史研究的基本层面与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为切入点，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前沿与学术走向，并结合具体事例来说明其有望实现的途径与方式。

一、中国环境史研究前沿

按照较为通行的划分，环境史研究包括自然环境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以及人类对于环境的思考等，每个层面均包含多个专题，本文拟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来加以概括说明。

首先是环境演变的过程、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。

在现代观测、记录出现之前，研究环境演变需要借助文献记载、考古发现以及各种自然体所加载的环境信息（又称古环境感应体）。^④当前，采用最新技术手段进行具体分析十分关键。炭测年现已利用加速器质谱（简称 AMS）分析，精度高、速度快、样品需求量少。在物种方面，以前研究多从形态分析，而脱氧核糖核酸（简称 DNA）技术将此类检测提高到分子水平，考古学界据此否定了康家水牛是中国本土驯养之说。^⑤再如，树木年轮反映年际、生长际的冷暖干湿变化，但不同地点、不同树种与其环境要素之间关系如何却需要具体分析。据研究，生长季前期的土壤水分含量是秦岭东部华山松生长的限制因子。^⑥若此，华山松的年轮变化则更能反映当地的干湿状况及其变化。可见，生物与其所处环境存在对应关系毋庸置疑，但生物与哪些环境要素存在关系、存在怎样的关系，却是学界需要攻克的难题。

^{*} 本研究得到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”（厦门大学项目号 20122210010）资助。承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，谨表谢忱！

① Mark Elvin, “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: An Agenda of Ideas,” *Asian Studies Review*, vol. 14, no. 2, 1990, pp. 39-53.

② J. R. McNeill, “China’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,” in Mark Elvin and Liu Ts’ui-jung, eds., *Sediments of Time: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*, Cambridge and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8, pp. 42-48; 刘翠溶：《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》，《南开学报》2006 年第 2 期。

③ Maohong Bao, “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,” *Environment and History*, vol. 10, no. 4 (November 2004), pp. 475-499; 王利华主编：《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7 年，“前言”，第 4—5 页；钞晓鸿：《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》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2004 年，第 50—54 页。

④ 张兰生、方修琦、任国玉编著：《全球变化》，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90—91 页。

⑤ 刘莉、杨东亚、陈星灿：《中国家养水牛起源初探》，《考古学报》2006 年第 2 期。

⑥ 参见邵雪梅：《树轮年代学的若干进展》，《第四纪研究》第 17 卷第 3 期，1997 年 8 月。

在研究环境演变的过程中,研究者还需要多视角、多指标,冀以建立、考察各类替代指标的时间序列、空间分异,并揭示环境演变的驱动机制。如区域气候方面,近百年来台湾岛气温增高,年均日照时数、每日高低温差、起雾频率均有所减少,研究认为台湾局部地区、东亚与全球尺度的因素均为影响因子,但影响比率会因不同气候参数而存在差异。^①

其次是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及其内在机制。

环境史不仅需要考察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,而且还要揭示互动背后的内在机制,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明清“小冰期”,江南农民以各种手段加以应对,包括减少种植早稻、增加早熟品种的晚稻,水稻亩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。^②若无深入研究,仅凭气候变冷、粮食亩产增加两个表象,就会误以为二者可能是负相关。不过明清江南地区,各气候因子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粮食生产还有待探究。另外需要注意,不同物种生长期对于各气候因子的反应也有所不同,甚至存在负相关,如在北方冬小麦区,若冬季较常年温暖反而不利于小麦生长,影响来年的长势与产量。因此,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及其内在机制需要具体分析,并注意其在不同物种之间和时空条件下的差异性、相似性以及一致性。

来看北方的事例,对乾隆朝以来西安气候变化与农业收成的研究表明,夏季降水量与秋收关系显著,夏收与上年秋至当年春的降水明显相关,而温度的年际变化与收成却没有显著联系。一个悖论现象是,1885—1900年降水有所增加,但收成仍保持在较低水平,研究者推断这是由于经济衰退、社会混乱造成的。^③后一解释有待论证,因为同治年间关中的回民起义虽延续十余年,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,但在光绪朝(1875—1908)前中期,农业生产已基本恢复,所谓回民“叛产”的开垦已大致完成。因此,要么是上述现象分析有误,要么是相应的解释出现问题。进而言之,气候变化与粮食供应的关系如何呢?在18世纪的广东,气候变化虽导致产量和价格波动,但产量和价格之间的负相关却较弱。在清代长江三角洲,短期气候变化影响粮价变动,但是长期观察却显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。研究者认为,影响粮价长期变动的因素中,货币、人口、水利、市场发育、政策措施等的影响比气候变化更为显著。^④

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及其机制十分复杂,涉及环境因子与影响时效,社会经济结构与时空差异,这是环境史研究面临的很大难题。

最后是人们对环境的认知、态度以及相应的制度、设施等方面的问题。

人类不仅通过各种途径、方式认识环境,而且还会适应、影响环境。如对沧海桑田的认知,以前常以《数术记遗》的“未识刹那之殄促,安知麻姑之桑田”为证据,^⑤其实这是针对数学计算的,具有演绎推理成分,麻姑之类源于传说。至宋代,沈括发现太行山麓的螺蚌壳,并据以断定沧海桑田的变化。^⑥实际上在沈括之前,钦州知州陶弼游览灵山县,就发现了沧海桑田的变

① 参见刘绍臣、许乾忠、陈正平:《台湾地区近百年之气候变迁:区域及全球效应》,刘翠溶主编:《自然与人为互动:环境史研究的视角》,台北:“中研院”、联经出版公司,2008年,第73—85页。

② 参见李伯重:《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人”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》,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1994年第4期。

③ 参见郝志新、郑景云、葛全胜:《1736年以来西安气候变化与农业收成的相关分析》,《地理学报》第58卷第5期,2003年9月。

④ 参见王业键、黄莹珏:《清代中国气候变迁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》,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1999年第1期;马立博:《虎、米、丝、泥: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》,王玉茹等译,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2年,第263—273页。

⑤ 《算经十书·数术记遗》,钱宝琮校点,北京:中华书局,1963年,第538页。

⑥ 参见沈括著,胡道静校证:《梦溪笔谈校证》卷24《杂志一》,上海:上海出版公司,1956年,第756页。

化痕迹，“下有盘石螺蚌负之，予疑上古之时海渐于此”。^①可见沧海桑田的变化，从传说到实物，人们发现的证据渐趋增多。至于生态的变化及其原因，古人亦有探讨，学界的发掘仍远远不够。如嘉靖《庆阳府志》不仅记载了生态变化与连锁反应，还强调其中的人为原因，“岂尽皆天时？人事渐致哉”！^②这一认知堪与当代媲美。不过历史上人们对于生态、环境究竟有何种认知，达到了何种水平，尚待深入研究。

对于生态变化、环境恶化，人们也会采取各种方式、措施加以应对。例如，清代中后期玉米在南方某些山区广泛种植，曾带来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，道光《宁国县志》不仅从逻辑上，而且以实例证明山区玉米种植所引发的连锁反应，该县知县梁中孚于是建议退耕植树，种桑养蚕，兼顾经济与环保效益。^③此类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值得系统发掘，而民间环保意识与行动亦需重视。例如，清代秦巴山区开垦力度很大，鄠县（今户县）涝峪口，沙石壅积，溪水泛滥，威胁村堡与百姓安危。时人认为，根本的防治措施在于恢复植被、保持水土，“非荒此山使树木丛生以聚沙石而阻横潦不可”，于是购置山地，立碑示禁，恢复植被。^④此与现代某些山区的保护思路并无二致。

可见，古往今来，一些环保理念与措施可能并不落伍，但环境恶化整体上并没有得到明显遏制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落实环保措施任重道远。

二、中国环境史研究展望

如本文开篇所述，中国环境史的发展走向，学者已经提出了若干主题与切入点，这里从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出发，就中国环境史的资料、方法以及论题等方面的趋势及其实现方式、需要注意的问题，提出一些粗浅看法。

在资料方面，除了利用考古发现及自然体所加载的环境信息之外，以往史学研究中不太注意的诗歌、仪式、传说、图像等今后也值得大力发掘，囿于篇幅，仅举两例说明。

一是传说类。传说中包含着丰富的环境信息及人们对于自然的认知、态度与改造。例如，《列子·汤问第五》先载“愚公移山”，晋代张湛注，愚公有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心愿定会实现。人们改造自然，自然环境也会随之变化。接着又讲述“夸父逐日”，反讽面对自然规律，“夸父（自）不量力”，张湛借而主张“顺天地之道，因万物之性”，^⑤即尊重自然规律。这两则故事及张湛的解释，肯定了人类的能动性能够改造自然，但同时也主张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规律。笔者以为，在利用传说等材料进行环境史研究时，不必纠缠于故事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分野，分析重点可以有所转移，比如从传说的性质转向功用，从传说发生的年代转向讲述的年代，从传说的情节转向寓意，如此等等。

二是图像类。图像具有直观性的特点，可以再现物体外观，为环境史研究提供直观证据，所涉及的内容甚至能够深入到遗传学的问题。例如，动物的白化现象属于遗传变异，最明显的特征是非白色动物的被毛终生呈现为白色。体色是判断白化动物的最主要指标之一，而在现代标本技术出现之前，出土动物的体色、表皮是难以保存的，但绘画等图像作品却可以弥补该方

① 嘉靖《钦州志》卷1《山川》灵山县，嘉靖年间刊本，第19页b。

② 嘉靖《庆阳府志》卷3《物产》，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刻增修本，第20页a—b。

③ 道光《宁国县志》卷12《物产风俗·补遗》，道光五年（1825）刊本，第4页a—5页b。

④ 《买山义行记》，咸丰十年（1860）立石，碑存陕西户县涝峪镇涝峪口小学。

⑤ 列禦寇：《列子》，张湛注，四部丛刊本，第3页a—4页a。

面的信息。据记载,有人曾向乾隆进献白麇一只,郎世宁还专门据以绘有《瑞麇图》,并配诗曰,“岂意牲牲属,偏成鹭鹭形”,“鹭鹭”即指动物毛色洁白光亮。麇的被毛通常为棕色,夏季毛色稍淡。^①而画中麇子体色纯白,^②从变异特征来看,应属白化麇,为人们提供了白化麇的直观证据。不过需注意的是,绘画等图像作品既有情景再现的真实一面,也有夸张虚构的艺术成分,需要具体分析。

在方法方面,环境史涉及多学科,需要跨学科方法不言而喻,兹以生态学为例加以说明。

以前关于动物灾害的研究,学者经常断定人为开垦、破坏植被是致灾因子。但若是根据生态学认识,某动物增多或进入人类生活区,原因复杂,涉及种群的时间动态与空间格局。种群是一定空间中同种个体的组合。自然种群数量变动有多种表现,除了种群平衡之外,还有不规则的波动,周期性的振荡,种群的暴发、衰落、崩溃、灭亡以及生态入侵等,气候、食物、季节变化、遗传、内分泌、疾病、个体离开双亲等均是影响因素。^③因此,史学界所谓的动物灾害,显然不只是人类活动引起的,自然灾害与正常时期均有可能发生,到底是何种原因引致发生则需要细致鉴别和深入分析,不能简单地一概归因于人类导致的环境恶化。

结合生物学、生态学的科学认识,有助于评估历史上相关认知、对策的成就与不足。正德《琼台志》认为蝗虫种类很多,其中的纺织婆、稻虾绿以及刺蚱,^④符合现代蝗虫分类所说的飞蝗、稻蝗、竹蝗。但长期以来,国人在蝗虫繁殖方面存在误区,一直以为“鱼虾卵育”,即蝗虫为鱼虾所生。^⑤不过古人的某些治蝗方法却与现代非常接近。现代人认为,飞蝗产卵对土壤的疏松与结实程度有所选择,深耕是除卵治蝗的重要手段。^⑥而清代上报给朝廷的建议中,即认为滨水未耕之地“最易生蝻”,要求翻犁土地,以灭蝗蝻。^⑦除却自然因素,古人亦认为蝗灾发生也是社会产物,与官员的修养、政绩存在密切关系,所以治蝗也是“蝗未作修德以弭之,蝗既作必捕杀以殄之”。^⑧此类问题正是环境史中社会文化分析的用武之地。

在论题方面,目前中国环境史较多集中于环境史译介、农业垦殖、灾害救治、水资源开发、疾病医疗、生态思想、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等议题,在广度与深度上尚有很大的开拓空间。例如,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、晚近以来的环境变化、环境政策与落实、族群与环境、聚落建筑与环境、近现代环境史、环境事件及现代职业病、海洋环境史、环境保护、全球环境史、种族性别环境史等方面还比较薄弱。受国际潮流及国内研究的推动,未来有望在城市环境史、外来物种与环境、特殊时期(如战争时期)环境史、资源与交通、环保宣传与教育,以及环境正义等方面取得较快进展,环境与社会文化相结合也将得到明显加强。

质言之,资料、视角与方法是为论题的拓展特别是认识的深化服务的。例如,清朝封禁某些荒野平原及附近山地,各类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,呈现出一派天人和諧的美好景象,对此不

① 吴跃峰、武明录、曹万萍等编著:《河北动物志·两栖·爬行·哺乳动物类》,石家庄: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9年,第363—364页。

② 《郎世宁画集》,天津: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,1998年,第74页。

③ 参见孙儒泳编著:《动物生态学原理》,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年,第124—162、200—273页。

④ 正德《琼台志》卷9《土产下》,正德年间刊本,第8页b—9页a。

⑤ 周焘:《请除蝻种疏》,《皇清奏议》卷47,民国年间影印本,第12页b。民国《济阳县志》卷1《舆地志·物产》,1934年刊本,第38页a。

⑥ 马世骏等:《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》,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65年,第25、267页。

⑦ 《呈捕蝗伐蛟要略》(具体日期不明,应为清中期),军机处录副03—2495—062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⑧ 陈芳生撰:《捕蝗考》(不分卷),学海类编本,第15页a。

能限于经济分析，是否基于“荒野精神”也颇值得怀疑。东北地区被清朝视为龙兴之地，清代中后期逐渐弛禁开垦，不过在封禁与开垦之间，耕殖者的身份至为关键。呼兰县在放垦闲荒的过程中，“向准该处旗丁耕种，而禁民户入界私垦”。^①可见，放垦仅限于具有特殊身份的旗人，普通百姓则被严令禁止。从环境正义等立场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某些现象与过程，无疑可深化认识，并可与原有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研究融为一体。

医学社会史的名实与研究取向^{*}

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、医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化成

一、指称的纠葛及其内涵

20世纪中叶以降，特别是70年代以来，西方史学界兴起了对疾病、医疗问题的研究；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，中国史学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，并推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。但究竟该如何指称这一研究？国内学术界混杂使用“医疗社会史”、“疾病社会史”、“医疗社会文化史”、“生命医疗史”、“医疗史”等概念，这与同属新型研究但概念较为明确统一的“环境史”、“全球史”、“经济社会史”等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指称的纠葛，体现了不同学者对该研究领域内涵的复杂认识，也反映了相关研究的一些偏向和问题。

上述内涵突出表现在两方面：研究内容的多元化和研究取向的史学本位论。国内学者早先多重视疾病、医疗的社会意义和影响，较为符合“医疗社会史”或“疾病社会史”之名。^②但后来受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，加之中国古典医学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，学术界开始重视、提倡新文化史倾向的研究；并且，考虑到“社会史”不能包容这日趋多元的研究，学者们或称其为“医疗社会文化史”，但更多地还是倾向于称之为“医疗史”，“广义的医疗史不仅仅关注医生的医疗……的历史，也包括疾病史和医病关系史”。^③那么，与其进行狭义、广义的区分，何不采用传统的“医学史”概念呢？于赓哲指出，“这里重点在于‘疗’字……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在于认定医疗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行为，更是一种社会活动，有人的主观性因素在起作用，与当时、当地文化背景息息相关。故此，‘疗’字可以彰显‘人’的作用”。^④而这实际上是历史学

① 民国《呼兰县志·呼兰县大事年表》，1930年刊本，第3页a—b。

*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专项经费支持项目“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医学及其比较意义研究”（项目号14SZZD01）的阶段性成果，同时还受到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（项目号NCET-13-0886）的资助，匿名审稿专家和侯甬坚、俞金尧、顾奎斋等先生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，谨致谢忱！

② 参见曹树基：《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（1580—1644年）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97年第1期；余新忠：《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。

③ 参见余新忠：《新世纪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刍议》，余新忠、杜丽红主编：《医疗、社会与文化读本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，“导言”，第I—Ⅺ页；《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》，《人文杂志》2013年第10期。

④ 于赓哲：《唐代疾病、医疗史初探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“前言”，第2—3页。